

# 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全球话语权刍论

——基于海外研究相关认识及其辨析的探讨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学术话语权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1960年代以来,海外如欧美、日本等学者对中国环境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研究论著陆续为国内学界熟知。但通过对墨菲、休斯、伊懋可和日本学者等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由于研究目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主客观原因使然,其相关认识存在论证粗疏、差错乖误、自相抵牾、有失于允恰乃至“西方中心论”支配下的傲慢、偏见等情况。中国历史环境当以国内学者深入研究形成的认识为准,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全球学术话语权,既是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举措,更是对海外研究错误结论乃至西方本位主义错误认知进行有效回应和深刻批判的需要。

**【关键词】**学术话语权;中国环境史;结论辨析;海外研究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6-0003-15

##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Overseas Research Related Conclusions and Analysis

CHEN Ye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building China's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Since the 1960s, scholars from overseas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merica, and Japan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ir research works have gradually become well-known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But through a review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scholars such as Rhoads Murphy, Hughes, Mark Elvin, and Japanese scholars, it was found that due to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such as research objective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values, their conclus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rough arguments, errors, self-contradiction, inaccuracies, and even arrogance and prejudice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Western-centrism.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formed by domestic scholars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Constructing a glob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deepen research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but also a necessary response and profound criticism of erroneous conclusions in overseas research and even Western-centrism misconceptions.

**【收稿日期】**2024-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历史地理视野下的芍陂水资源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研究”(18BZS16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治水历史脉络梳理与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研究”(22JZD03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灾害文献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8ZDA196)

**【作者简介】**陈业新(1967-),男,历史文献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环境史、灾害史等研究。

**Key words:**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conclusion analysis; overseas research

## 引言

环境史即环境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专门意义的环境史研究滥觞于1960年代的美国;海外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者,主要为欧美、日本学者。日本学者如增渊龙夫等早期有关传统中国山林薮泽、水利开发等研究,部分涉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相关内容<sup>①</sup>;欧美相对较早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者或为墨菲。他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过去的3000年,中国通过逼近自然式的集约开发,造成了“很可能比本世纪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环境改变规模都要大的环境后果<sup>②</sup>。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广义的历史环境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积累丰厚。1990年代以降,随着环境史学的全面兴起,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日益繁盛,涌现出如休斯、濮德培、麦克尼尔、伊懋可、马立博、穆盛博、原宗子、村松弘一、孟一衡等一批学者。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著述也陆续通过译介而进入国内,成为学界洞悉海外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对促进学术发展具有积极之功。

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往往由于其研究视角、思维模式和理论分析之异,常给人以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但因研究目的差异、文化隔膜、语言文字障碍、社会体验和价值判断之殊等故<sup>③</sup>,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在文化传统的体悟与认知、古文献的解读、史实的判断与理解等方面,往往存在误解、误读、误判等缺憾。因此,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面,有的结论貌似新颖,但细究起来仍不时可以发现有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差错乖疏、自相抵牾乃至傲慢、偏见的情况,与国内有关传统中国环境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者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但学界对此缺乏必要的专门辨析;同时,国内环境史研究还存在“中国历史话语权的外移”现象,有些学者常“言必称西”,或以西方史家马首是瞻,奉外来史著为主臬,无视海外研究中难以克服的“文化的偏见、理论的执着以及双重标准”等痼疾,甚乃以之为准。学界因此发出了要“建立中国人自己话语系统”和学科体系、“找回”中国历史研究话语权的呼声<sup>④</sup>。有鉴于此,本文重点选取了几则海外有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并对之进行辨析,进而就建构中国环境史研究全球话语权的问题略陈刍蕘管见。

## 一、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相关认识与辨析

### (一)墨菲、艾文贺与休斯等关于《孟子》中牛山的认识与辨析

《孟子·告子上》有段论“仁义之心”的文字,引起海外环境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是为后世熟知的“牛山濯濯”典故:“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

① 参见[日]增渊龙夫:《先秦时代的山林薮泽及秦的公田》(1957),见氏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45-286页;佐藤武敏,古代における江淮地方の水利開発:とくに陂を中心として,人文研究,13(7),1962, pp. 68-85.

② Rhoads Murphey, Man and Nature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 No. 4 (1967), pp. 313-333.

③ 如英国学者在评价国内学界甚为推崇的美国环境史研究重要人物纳什时曾说,“纳什的环境史,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知识传统、经历和个案研究”([英]迈克尔·威廉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马宝建等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

④ 焦润明:《环境史学论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也哉?……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由此事例得出结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 1. 相关认识

据笔者周见,海外学界从环境史的角度关注这则文献者,有墨菲、艾文贺与休斯等。墨菲在其1993年底参加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从比较的视角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史。在强调中国“好几千年以前已开始不断伐林”时,墨菲先是举“大禹辛苦治水的部分原因,似乎即是源于黄土坡地上的伐林所造成的河流淤积”之例,然后认为殷人的狩猎活动“必伴随着焚林、拓垦地对地表树木造成的侵害”,最后称“到孟子的时代,伐林和紧跟而来的河流水道淤积,已相当广泛,一如他举例而后来成为古谚指出的:‘山空水恶’,以及他对梁惠王的忠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在考察中国“五千年之久的伐林过程”时,墨菲引用了上述《孟子》的文字,称“战国时期以来,地表覆盖的森林渐次消失,……在铁器和铁斧变得广为人使用后不久,就开始此一过程,而不幸的是,现在仍然持续着。”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许多学者都很好奇”的问题:“中国人既有‘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观念,何以竟完全使他们的环境堕落。”<sup>①</sup>

此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学者艾文贺在其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的论文中,也引述了这段被他视为《孟子》中“最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段落之一”的文字。认为孟子用“被砍伐”而至“濯濯”的“牛山图像”作为“最重要和最翔实的例证”,向世人表明“人的本性可以被践踏和抹去,就像牛山被系统地剥夺了既往葱郁的植被一样”。但同时,“这个故事也说明了我们的道德新芽和山上植被的坚韧性;尽管二者都遭受了持续而严厉的命运,但它们仍继续生长出新枝与嫩芽”。关于战国时的“牛山是否已被破坏得如此严重,如此长久以至于它无法自我再生的问题”,虽然学界仍“存在一定分歧”,但因研究视角不同,艾文贺似乎认为不甚重要,关键在于孟子希望“通过类比”的手段,实现了其说明“人们是否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和损毁”关乎社会道德是否有望“再生”问题的目的<sup>②</sup>。

美国环境史研究先驱休斯早在1989年就发表了《孟子关于中国古代环境问题的处方》<sup>③</sup>一文,对孟子的环保主张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孟子环境思想的价值在于,他将源于其实践经验、儒家对人类价值的关注,以及道家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识结合起来而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议”。在考察孟子环境思想时,休斯援引了牛山的文字并加以阐述。休斯后来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关于牛山的论述,除新增引用艾文贺的研究等文献外,其他内容基本上源自其1989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如在2006年面世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环境史的先驱”中,休斯将孟子与柏拉图进行比较,并以《孟子》中“引起现代环境史学家和森林史学家注意”的牛山为例,称“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多遭受过和牛山同样命运的山地”。并引用《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文,云孟氏“认识到了森林砍伐的加重及其原因”,“建议谨慎地从事木材砍伐和树木种植”,“显示了防止木材浪费的智慧”。同时,他援用顾立雅의《中国思想》一书文字曰:“如果中国人曾注意到了孟子在最后这一方面的劝告,那么,他们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地位就会稳固得多”<sup>④</sup>;在其2009年出版的《世界环境史》

① [美]罗兹·墨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刘翠溶等:《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77、78、84、91、92页。

② Philip J. Ivanhoe, Early Confucian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Mary Evelyn Tucker, et al,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8, 75.

③ J. Donald Hughes, Mencius' Prescriptions for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 13, No. 3/4(1989), pp. 15-27.

④ [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3页。顾立雅的原话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孟子)提倡保护渔业和森林。如果中国人在这最后一点上听从了孟子的建议,他们在现代世界中的经济地位就会更加稳固。”(Herlee G. Creel,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82.)

一书“古代社会生态观及影响”中,休斯以“西安:中国古代环境问题”为题,重点以《孟子》牛山记载为对象,讨论了中国古代生态意识与生态状况问题。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处于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货币的使用,商业空前繁荣。农业产品已无法满足激增的人口,为了增加小麦和稻谷的产量以及提供大量燃料和建筑用材,越来越多的森林被开辟为农田用地。”同时以艾文贺的研究为据,言孟子“亲眼见证了”“牛山因树木砍伐而变得光秃”的“森林被破坏的过程”,“并且想到由于放牧,树木无法再生长而造成森林的长期破坏”,称:“毫无疑问,在中国许多山都遭受了牛山一样的命运”,并以秦汉人口增长、区域开发空间拓展、林木取伐,以及“随之而来的是继续数个世纪的水土流失以及洪水灾害”为据,就“中国古代环境问题”得出结论:“中国将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心当中森林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sup>①</sup>。

## 2. 相关辨析

关于上述考察,我们不妨稍加辨析:首先是艾文贺的研究,其主题虽然是环境伦理这一现代意义上的论题,但讨论基本以《孟子》文本为基础而展开,没有偏离“道德”主旨。同时,其研究结论也颇为客观、中允,未在文本之外作过多的主观发挥。

其次是墨菲的研究。通览其文,不难发现其研究性不足的缺陷,有关中国环境史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的产物,这与墨菲的研究领域有关。尽管墨菲出自地理学,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口岸城市等,并以此理解现代中国<sup>②</sup>。在涉足素无积累的中国环境史时,除借鉴相关成果外,别无他途。此其一;其二,墨菲的中国历史环境变迁认知,是典型的“环境破坏论”或“环境衰败(恶化)论”。受此影响,由于早有“定论”,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往往就是援用相关材料或论据印证其“定论”。如墨菲在文中即引用了一则与其判断相同的材料。据称,这是其一个来自广州“小村庄”的学生以自己“祖父对十九世纪村庄的回忆为基础”而于1960年代早期为他而写的一篇“论文”。而该文描述的“村庄周围山坡地上的林地曾经发生的情形”——因过度砍伐而变成“童山”,墨菲认为“这是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合理的缩影”<sup>③</sup>。作为学界对社会批评工具的“环境破坏论”,滥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直接用环境恶化论者的方式进行写作”和对包括如“古代和现代滥砍滥伐的程度”等论题在内的环境破坏“进行一个评估”的研究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推动环境史研究“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进而“成为专业历史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局面的形成,具有积极之功。然而,当“构成环境史内容的都是清一色乏味且重复的有关灾难”“写作风格”“积渐而至”为环境史研究的主流观点时,“环境破坏论”难免沦为环境史研究的“陷阱”<sup>④</sup>。学术界对此也已有辨析<sup>⑤</sup>。因此,墨菲关于中国环境自“战国时期以来,地表覆盖的森林渐次消失”并且“不幸的是,现在仍然持续着”的“环境堕落”认识,是学术界需高度警惕的环境史研究“陷阱”。其结论既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相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历史环境的变迁具有极强的阶段性、区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非简单的主观判断可以概括的。

最后为休斯的研究。从休斯反复引用《孟子》一书内容可知,他对《孟子》颇为熟悉,但同时,除《孟子》外,他或对中国古代典籍知之有限,毕竟中国环境史研究非其所长。仅就休斯对《孟子》牛山记载的讨论而言,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他由点到面,从牛山联系到其他山地,断言中国很多山地“毫无疑问”地遭受过牛山一样的命运。在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把牛山的境况普遍化;其二,他由古推今,根据上

① [美]J·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2版),赵长风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76、80页。

② 李鑫妍:《罗兹·墨菲和他的亚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③ [美]罗兹·墨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90-91页。

④ [美]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译,《全球史评论》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49页。

⑤ 参见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古牛山林木的一时毁坏记载,对中国未来的环境趋势做出大胆预测,称“中国将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心当中森林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其三,他由此及彼,将某一具体历史现象或问题扩大化,把孟子“提倡保护渔业和森林”的主张与中国“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地位”是否愈为“稳固”相联系。

那么,如何看待休斯的这些结论呢?我们还是从牛山之木的毁损说起。据《战国策·齐一》记载,其时牛山所在的齐都临淄居民7万户、约35万口,仅其每年薪炭、棺木消费就需要近50km<sup>2</sup>面积的森林,但牛山面积仅3km<sup>2</sup>,林木需求与实际可采伐量之间差异巨大,牛山的命运当属不争的事实<sup>①</sup>。然而,牛山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否为普遍现象,值得细加究探。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国家框架下的自然环境和整个人类间的关系。论者以山林藪泽为例<sup>②</sup>,按照人类与山林藪泽的距离,将人与山林藪泽的关系分为三类:“人类附近的自然”,即和人类居住村落接近的山林藪泽。统治者对此类自然的态是禁令、祭祀和征税。百姓深知此类山林藪泽是国家仪式、法律和苑囿等“禁令”的对象,是不能自由进入的世界;“人类附近,但非国家权力所及的自然”,常常成为叛乱据点和隔世的地方;“远离人类的自然”,人类难以接近、人们想象中的魑魅魍魉匿身处。以往历史研究中的“自然”对象,是人类附近的自然<sup>③</sup>。这一划分,虽未尽妥,然颇有启发之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利用,与其生产能力、获取生活资源的范围有关。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历史时期人类面对的“自然”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从类型上看,孟子时代的临淄牛山,当属典型的“人类附近,但非国家权力所及的自然”。牛山因位于人口集中的都城近郊,又“非国家权力所及”,故而频遭斧斤之伐、牛羊之牧,终至“濯濯”。牛山的案例充分说明,彼时的森林毁坏,主要是“人类附近,但非国家权力所及的自然”,而“人类附近的自然”和“远离人类的自然”则各因国家保护和人类难以接近,尚未被人类染指,因此也就不存在休斯所谓的“毫无疑问,在中国许多山都遭受了牛山一样的命运”。休斯这一认识,和墨菲所谓的“这是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合理的缩影”结论如出一辙,是典型的“环境破坏论”。至于休斯所谓的“中国将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心当中森林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和中国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地位问题,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970年代末的12.7%上升到目前的24%以上<sup>④</sup>、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事实,都充分证明休斯所云极其片面,既无根据,也和实际不符。而且,根据恩格斯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等地居民为了“得到耕地”而“毁灭”森林,致使“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以及古希腊过度畜牧,山羊“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等论述<sup>⑤</sup>可知,人类文明在其早期的发展中,其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地区都曾遭遇了与《孟子》牛山相似的环境问题。如日本学者原宗子就认为,“就前近代农业地区的形成过程来说,不论东方与西方,一般都可以说是森林草原的农地化过程”<sup>⑥</sup>。而且,这种以毁坏植被为前提的农业,不可避

① 参见陈业新:《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体系述论——以内容体系为对象》,《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② 山林藪泽的管理、开发、税赋征收等素为日本学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内容,受此影响,其后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也较多以山林藪泽为对象而展开。具体参见[日]原宗子《中国古代生产技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亿里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日]平勢隆郎,《中国戦国時代の国家領域と山林藪沢論——中国戦国時代の国家領域と山林藪沢論》,松井健,自然的資源化,弘文堂,2007年,第27-82页。

③ [日]村松弘一:《中国古代的山林藪泽——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历史》,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89-501页。另见[日]村松弘一,《中国古代の山林藪沢——人間は自然環境をどう見たか》,《学習院史学》(43),2005年,第23-37页,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環境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16年,第165-183页。

④ 《试谈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全国林业局长会议参考资料),《湖南林业科技》1979年第2期;《打造森林“粮库”让中国饭碗更“丰盛”人民生活更富裕》[EB/OL]. [2024-11-17] <https://news.cctv.com/2023/05/17/ARTIAOppib-M0mTH-WUmw6blpG230517.shtml>.

⑤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8、311、313页。

⑥ [日]原宗子:《中国古代生产技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亿里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

免地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地区发生了以沙漠化为主的“生态环境恶化”现象,不仅“从根本上丧失了支持其文明的集聚‘财富’的力量”,而且这些地区“创造古代文明的人们和他们的语言”也随之“失落”;而中国即使存在这些环境问题,然因中国“能够在最长时期内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持续发展”,非但“保持着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且还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持续发展<sup>①</sup>。这一认识虽非针对休斯,但作为“他者”,则较好地回应了休斯的论断。

## (二)伊懋可的认识与辨析

伊懋可早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曾提出了如“中世纪经济革命”、帝制晚期经济陷入“量的增长,质的停滞”即“高水平平衡陷阱”等研究论断<sup>②</sup>。按照伊氏自己的说法,他是在1998年修订《中国文化地图》一书后“迅速进入环境史研究”领域的<sup>③</sup>。但其实早在1990年,他就发文提出了以技术、经济为中心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构想,随后又从环境变迁、环境遗产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农田水利工程及其环境后果进行了考察<sup>④</sup>。2004年,他将其发表的中国环境史研究重要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大象的退却》一书。伊懋可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结论,值得深入讨论之处颇多,这里仅以其《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大象的退却》(以下分别简称《增长》《退却》)为例以喻之。

### 1. 关于中国“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的认识与辨析

伊氏之所以要研究中国环境史,他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为考察今日中国逐渐形成的环境危机提供一个视角”,试图证明“这一危机的起源在时间上早于现代”<sup>⑤</sup>。他在《增长》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审视了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今天”的中国历史。认为过去的3000年,中国为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扩大土地垦殖规模,凭借如水利等技术对灌溉农业的支撑,复以中国空间广大、资源丰富,中国的发展不仅得以延续,甚或“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好”而“引领世界”。然而,长期的农业扩张,以及与之相伴的水利灌溉工程日渐枯竭和大量森林资源逐渐消失,“帝国末期和‘现代’时期之前”的中国环境遭到了“阿拉伯化”的破坏,“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前现代中国经济因此被“锁定”在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中而具有不可持续性。用他的话说,这种人类活动导致中国环境的破坏和衰竭,在“本质上不是一种现代现象”,而是几乎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有记录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发展是“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sup>⑥</sup>。

尽管伊氏自己也承认,其关于中国过去三千年来在经济与环境的勾勒“过于简单化”<sup>⑦</sup>,但其说在海外颇有影响。如麦克尼尔就曾引用伊氏的“看法”,称“中国追求生态上不持续的形态已有三千年,藉着定期的以新技术或在空间上扩张而避免了完全的崩溃”<sup>⑧</sup>。然而,严格地说,伊氏“不可持续发展”论并非其原创,放眼学术史,或与墨菲的研究有关。如前所述,早在1960年代,墨菲在其一篇论文中就指出,“在过去的3000年,中国人通过逼近自然和集约开发,改变了他们的环境,改变的规模很可能比本世纪

① [日]原宗子:《我对华北古代环境史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之一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英]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王湘云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

③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④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 Agenda of Idea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14, NO.2 (1990), pp.39-53. Mark Elv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No. 6(1993), pp.7-46.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6(1998), pp.733-756.

⑤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序”,第6页。

⑥ Mark Elv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No. 6(1993), pp.7-46.

⑦ Ibid.

⑧ [美]约翰·麦克尼尔:《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51-52页。

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环境的改变都大”<sup>①</sup>。虽然伊氏文中没有说明,其参考文献中也未提及墨菲的研究成果,但其“可持续发展”论或与墨菲的启发、影响有关,就像伊氏的《中国的历史之路》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关一样<sup>②</sup>。

由于论证粗疏,伊氏“不可持续增长”论受到了德国学者的质疑。论者根据伊懋可等合编的英文版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积渐所至》<sup>③</sup>的研究,认为伊氏“可能在这个粗略的估计中走得太远”,其所谓的“中国环境衰败”距今只有约300年。不仅如此,这位学者还提出了“一种与伊懋可的观点不同的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具有“高度的生态稳定性”,并从水稻种植传统方法对肥料的少许需求、梯田的防止土壤侵蚀作用、系统地使用粪尿肥料等方面对其稳定性的结论进行了阐述,同时以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李比希的中国人“从土壤中取出多少植物养分,又以农业品残余的部分的形式全部归还给土壤”<sup>④</sup>的论断为据,对中国传统农业使用人畜粪肥的做法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农业中确实在很长时期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可持续性,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延续了几千年”<sup>⑤</sup>,从而否定了伊氏中国“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之说。

可能受此影响,在一次学术访谈中,伊懋可对其说进行了解释、补充或修正。他首先重申自己“仍坚持”其中国3000年“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但同时又对这个“容易引起争议和似是而非的题目”及其“审慎的悖论”“措辞”进行了辩说,称“它不是一个系统理论的一部分”,而是“意在激发人们用新的方式思考”。强调3000年“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和“不可持续”两个命题。所谓的“可持续”指的是中国“前现代农业”。尽管他明确强调在“什么是可持续这些问题上”“还没有明确答案”,但认为“可持续”“不是一个单一的或一套体系,而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连续改变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为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而“连续”革新农业生产技术、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中国前现代农业因而具有“可持续性”,且“一直存在到现代的前夜”。这就是他“为什么说‘三千年’的原因”;而其“不可持续”指的则是农业持续发展的环境后果。他认为,一方面,为增加粮食产量而连续革新技术和“无限制地增加劳动量”具有“不可持续性”,“产生利润的过程经常使它给自己、给参与生产的人制造麻烦,尤其是在那些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另一方面,“持续的农业发展”是以“森林的破坏”和“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从长时段来看,“中国许多地方的森林破坏就是不可持续的,并导致了薪材和建筑材料短缺的范围的扩大”,致使老百姓可以利用的森林、山泽等“环境缓冲区”受到“连续”的破坏。伊氏指出,“几乎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得也有失”,“重要的是不要把中国农业和它在环境中的地位看成是几百年来固定不变的东西”,声言这就是他“想用‘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这个词表达的真实含义。”<sup>⑥</sup>但这一解释仍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其一,从逻辑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三千年的可持续发展”结论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是“可持续发展”,何以持续数千年?其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年轻学者孟一衡深受伊氏等学术著作的影响,但认为其

① Rhoads Murphey, *Man and Nature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967, Vol. 1, No. 4 (1967), pp. 313-333.

② 伊氏对自己“许多具体”而“新颖”的“论点”颇为自负([英]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第320-321页),然日本学者早就指出,其包括“唐宋之际是中世纪经济革命期”结论在内的“很多地方依据了日本的研究”([日]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上册,田人隆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06-507页);国内学者经统计也认为,其绝大部分史料来自斯波义信等日本学者的著述,进一步证实了其研究是“利用出自日本学者研究的二手成果”(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张天虹:《伊懋可“中古经济革命”论的价值与局限再认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③ Mark Elvin, et al,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德]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刘更另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⑤ [德]亚克西姆·纳得考:《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包茂宏译,《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⑥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研究存在“一些缺失的碎片”,即“长期的可持续利用甚至是保护的事例”。他以中国常见的杉木为例,从环境史的视角,“创新地使用当地和民间的新材料”,对传统时期的林木利用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在早期近代中国,人们通过实施新的复杂实践来促进森林种植,应对森林砍伐的威胁。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结果也并不完美,但是几百年中建立起来的造林体系限制了环境和经济的灾难。”这一“大造林”研究结论及其在“限制”中国环境“灾难”发生方面作用的积极评价,与伊氏“大毁林”及其导致的中国数千年“不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判断,具有霄壤之别。在伊氏那里,“长期的毁林和原始植被的消失”是评价中国历史环境变迁“趋势”的“决定性”指标。评论者认为,孟一衡的研究,不仅“修正了伊懋可关于前现代中国持续毁林的叙事”,而且也“颠覆”了西方“把中国历史看作森林锐减的故事的认知”,同时“还表明,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管理具有惊人的创新史。”<sup>①</sup>

## 2.《退却》的两个结论及其辨析

一是环境思想方面<sup>②</sup>,早在20世纪末,伊懋可在《帝制中国的环境遗产》一文中,曾提及“中国古代环保智慧”:“在中国某些古典著作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环保智慧,极可能被普遍误解:中国先哲关于开发资源的限制可能本非古代社会和谐的表现,更确切地说,而是对一场虽处萌芽状态但已经显而易见的生态危机所做出的理性反应。”<sup>③</sup>虽然伊氏对传统中国人与环境的“和谐”表示怀疑,但对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环保智慧”即环境思想是否“存在”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不过,他在《退却》一书中考察中国传统环境“观念”时,则声称“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中国’观念的自然观,甚至找不到这样一个谱系”,并将注意力转向诗词文学作品及其折射的环境意识<sup>④</sup>。那么,他所谓的“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中国’观念的自然观,甚至找不到这样一个谱系”的判断是否成立呢?

将其这一判断与他此前的“在中国某些古典著作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环保智慧”认识相对照,前后间差异不辩自见。这一不同,或可视作自相矛盾。伊氏关于中国不存在自己“观念的自然观”及其“谱系”的判断,既与中国传统典籍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事实严重不符<sup>⑤</sup>,也与国人关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评价相去甚远。事实上,中国文化不仅存在以“天人合一”<sup>⑥</sup>为突出特征的“可称之为‘中国’观念的自然观”,而且还有如儒、道等生态意识“谱系”<sup>⑦</sup>。伊氏对充分体现中国古代丰富环境思想的主体、典籍、流派、体系、内容、特色等缺乏足够的认知,没有更不可能如国内学人那样广泛梳理中国古代文献,同时也并没有关注到如199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召开的“儒学与生态”等生态学术会议及其论文集等相关成果<sup>⑧</sup>。

① [美]孟一衡:《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张连伟等译,光启书局,2022年,“中文版序言”“序:大造林”。

② 海内外关于环境思想的称谓不一,有环境感知、环境意识、环境感受、自然的感知、自然态度、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生态意识、生态思想、环境理念、环境认知等。但凡自然环境的认知、意识、理解、思考、态度(如保护)等,都为环境思想的基本内容。

③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6(1998), pp.733-756.

④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18、333-459页。

⑤ 前文所引墨菲的研究也陈述了中国人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哲学观念”这一西方“许多学者”的共识([美]罗兹·墨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92页)。

⑥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⑦ 具体可参见张云飞《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乐爱国《道教生态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蒋朝君《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6年)、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

⑧ 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曾于1997、1998年分别组织了以儒、道、释与生态为主题的3场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终以“儒学与生态”等为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参见 Mary Evelyn Tucker, *Buddh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harma and Dee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y Evelyn Tucker, John Berthrong,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rardot, James Miller, *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因此,在对中国环境思想即其所谓的“观念”进行研究时,他主要以诗歌等文学作品为对象。据论者统计,《退却》一书共引用了中国古代百余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词,很少进入国内学界关于生态意识研究的文献视野,但在伊氏那里,则被当作典型文献使用。既然在主流文献选择上都存在问题,又何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生态意识?其关于环境思想情况的判断和研究结论因此缺乏稳固的基础<sup>①</sup>。此其一;其二,诚如论者指陈的那样,“在环境史研究中,将具有虚构和想象性质的文学作品作为支撑性史料,穿越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无疑是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伊氏研究因此而陷入“证据不足和过度阐释的两难”泥淖,难免存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离合”等缺憾<sup>②</sup>。同时,在中国“第一个清晰的环境观念”的具体研究中,伊氏称:“到公元4世纪末,关于环境的观念首次明确地出现。这种观念所需的思想气质,反映在谢灵运的作品之中”,并以谢氏作品为例,称谢“是在倡导一种文明社会的荒野情怀”<sup>③</sup>。以4世纪为中国第一个有“清晰的环境观念”时期,显然和国内学界的认识差别不小;而且,关于谢氏的“荒野情怀”评价,也是源于西方环境史,尤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概念的套用<sup>④</sup>,是否妥当,深值斟酌。

二是环境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评价问题。在《退却》第六章“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中,伊氏以某些水利工程的堙废和河流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等为例,认为“大型水利系统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之一”;18、19世纪的“中国水利经济陷入前现代的‘技术锁定’模式之中,从而进退维谷”;对于这些陷入“‘技术锁定’模式之中”的大型水利系统来说,“每一种成功的解决方案往往都会引发新的问题”,中国传统水利工程因此“是一份伟大而沉重的历史遗产”<sup>⑤</sup>。这一结论,我们并不陌生,早在1993年伊氏发表的关于中国“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主题论文中就曾专门讨论过。

不可否认,如运河因漕运等特殊使命,在明清时期确实存在与“伟大而沉重”几分相似的情形。但若据此对传统中国的水利作用加以否定,显然过于片面。水利是农业经济的命脉,在传统中国尤其如此。所以,中国自上古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水利传统悠久,工程形态多样并广布全国,技术也日臻成熟,水利成效显著,为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工程支撑。这些工程是前人在与自然长期交往过程中为更好利用自然而服务社会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一笔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中诸多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灌溉、防洪或运输作用,并有30余项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而如芍陂等古老水利工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成功地完成转型升级,被纳入中国最大的灌区——淠史杭灌区,成为现代水利工程的一部分。而且,水利工程的修建,对其所在地区环境的改善也产生了积极成效。如关中东部地区地势低洼,泾、渭诸水积滞,形成大片“泽卤之地”。战国时,水工郑国修筑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阡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sup>⑥</sup>。通过水利工程经由淤灌的办法,解决了其泽卤的问题<sup>⑦</sup>,并经先民辛勤耕耘,关中在汉初即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sup>⑧</sup>。再如战国蜀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竣工后的都江堰,既“可行舟”,又能“溉浸,百姓飨其利。

① 缺乏充分文献支撑但妄下断语的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者并不是个别。如美国学者易明在其《一江黑水》一书中即云:比中国“破坏环境的传统”“更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中国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都是在传统的认识和哲学,比如儒家思想中形成的,而儒家思想常常激发人的需求,从而役使自然,获取利益。”([美]易明:《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②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范静静:《重评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征引史料问题》,《中国农史》2020年第1期。

③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48-349、353页。

④ 关于美国环境史上的荒野情怀,可参见侯文惠:《美国环境史观的演变》,《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

⑤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36、137、176页。

⑥ 《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8页。

⑦ 具体可参见李令福:《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57页。

⑧ 《史记》卷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4页。

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sup>①</sup>,彻底地改变了工程兴修前“江水初荡漾,蜀人几为鱼”<sup>②</sup>的环境状况,使成都平原至少在汉晋时期就成为享誉天下的“天府之国”<sup>③</sup>。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下,作为该会驻华科学办事处代表参观了都江堰。他在其后撰写的《中国科学》一书中,高度赞扬了“灌溉了成都平原的辽阔区域”的都江堰“灌溉系统”,称:“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过中国人。”<sup>④</sup>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较高的认知,并有亲临现场经历的李约瑟,关于中国传统水利工程的理解,已远远超越了伊懋可的认识。当然,也必须看到,有些水利工程如明清洪泽湖、大运河等,确实给传统中国区域社会带来了不容小觑的负面效应;另有一些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等可能兴盛于一时,而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则逐渐式微,失去了起初的功用和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利工程利大于弊,尤其是那些至今仍在发挥灌溉功能的水利设施。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技术工程,重要的是事在人为。因此,伊氏环境史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评价有失允恰。

### (三)日本学界的相关认识与辨析

这里重点以2004年日本专门探讨中国环境史的学术会议——“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为例。按照组织者的说法,此次会议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4000年来,中国大地支撑了庞大的人口,自然界被彻底改造,耕地利用达到极限;过去20年,灌溉、现代技术促进了边缘地区的农业开发,引起土地沙化、盐碱化,土壤肥力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而耗竭,城市化及消费习惯变化增加了农业、森林资源的需求,自然资源进口的增加对其他地区的环境形成压力。总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消费者<sup>⑤</sup>。会议主办方所指中国的环境问题,客观上讲,确实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会议立论的历史前提。其所指几千年来的中国自然环境改造,主要源自伊懋可的中国“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如当时任职于该次会议主办方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后任职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阿部健一就以伊氏“大毁林”观点为据,称“中国30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破坏其自然的历史。中国所有的土地都用来养活巨大的人口。中国的文明可以说就是一个最依赖森林或最牺牲森林的文明。”这一判断,是日本国内中国环境史的“‘环境破坏史’特别是‘森林破坏史’”的研究“趋向”与伊氏“大毁林”论相混合的产物。前已述及,伊氏之论已遭学界质疑;同时,原宗子早就指出,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就有接受“西洋人的亚洲观和中国观”传统,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其中不少“看法是错误的”。从环境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农业文明是人类几大文明中心中唯一能够较好地实现了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sup>⑥</sup>。因此,所谓中华文明是“最牺牲森林的文明”结论,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上述孟一衡的早期近代中国“大造林”结论即是有力的回答;另一方面经不起逻辑推敲。试想:若真如此,中国境内的森林早已为先民“牺牲”殆尽,这样的生态环境又何以能保障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延续发展?

① 《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7页。

② 岑参:《石犀》,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卷1《五言古诗》,中华书局,2004年,第237页。

③ 诸葛亮《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912页);《华阳国志》载都江堰修建后,“于是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202页)

④ [英]李约瑟等:《李约瑟游记》,李潇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⑤ 参见陈建明:《探寻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国际研讨会综述》,《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⑥ [日]原宗子:《我对华北古代环境史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之一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二是回到现实,中国环境存在一定问题,乃不争之实。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业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尽管这些成绩与国人的期待尚有距离,而海外一些学者却对这些成效视而不见,或选择性失明,至少说明其研究存在缺乏发展眼光看问题的不足。2018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中国的环境污染》一书中,作者加德纳曾就当代中国环境治理而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只关心经济发展而罔顾环境”的“过时”认识进行了“反驳”,指出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72年,而且近些年来进一步加强了环保工作,采取了如碳交易等环境治理措施,表明中国的环境保护并非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并客观评价说,虽然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成功地解决了国家污染危机”,但中国治理环境的决心毋庸置疑<sup>①</sup>。

三是对中国逐渐成为“超级消费者”的态度问题。虽然会议主办方对此没有给出其价值判断,但倾向性十分明确,即这个“超级消费者”给全球的环境带来了“压力”,或将成为“环境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首先,这一认知逻辑并非东瀛学界所特有,而是海外研究中国环境史者较为常见的思维模式。如马立博2012年在其著《中国环境史》“中国人的消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部分中,考察了16—19世纪中国的贸易发展,认为中国人的檀香、毛皮、鸦片消费需求,是引发太平洋岛国与部落大肆砍伐檀香树、俄罗斯探险者进入西伯利亚捕猎紫貂与狐狸、美国西海岸猎人宰杀海獭与海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大量种植鸦片等事件的诱因,并进而导致檀香树在夏威夷绝大部分地区“几乎绝迹”、紫貂从西伯利亚很多地区“消失”、美国西海岸地区海獭种群“面临灭绝”、南亚地区种植鸦片带来的生态“影响”等全球性环境后果<sup>②</sup>。其实,关于上述特殊物品消费对动植物资源的影响问题,早在30余年前,英国学者庞廷在其英文著作中就有与马立博观点完全不同的论述。庞廷认为,西伯利亚貂狐皮毛主要销往欧洲,欧洲商人为了满足欧洲人“对皮毛的追逐”而在北美“没有限制性”的捕杀,是很快耗尽并最终导致海狸、海獭等资源在北美各地相继灭绝的主要原因<sup>③</sup>;而鸦片种植生态影响的始作俑者则更为显然,南亚地区的鸦片种植、贩卖和获利者,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国是受害者,马立博把中国塑造为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与国人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具有黑白之别。其论断可能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知和价值判断有关<sup>④</sup>。

其次,关于中国成为“超级消费者”对环境“压力”的担忧,主要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是中国国民作为消费者,有没有消费的“权利”问题,从平等的角度而言,中国国民自然具有天然的消费权利;第二是消费水平的提高当无可厚非。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国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乃情理之中的事,但有些人因而对其产生的环境后果“忧心忡忡”。倘若中国仍停留于晚清民国或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消费水平,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中国对全球环境造成影响而担忧;第三是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水平相对较为“绿色生态”。两份研究报告颇能说明问题:一份是2007年英国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指出,若全世界彼时67亿人口都按照美国、英法等欧洲国家、日本的方式生活,人类分别需要5.6、3.9和2.9个地球的资源;而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仅需0.9个地球的资源<sup>⑤</sup>。另一份是201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在北京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该报告认为,目前人类生存方式所消耗的资源已达到地球可供

① Daniel K.Gardn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65-168.

②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1-296页。

③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204页。

④ 如史密斯曾就鸦片战争而云:“在美国,很多人听说过鸦片战争,但对它有深入了解的人不多。”([美]劳伦斯·C·史密斯:《河流是部文明史》,周炜乐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92页)。

⑤ 熊焰:《低碳经济:变革能源结构的重要支撑》,《求是》2011年第7期;刘正山等:《国民幸福总值及其对国际规则体系的影响》,《国外理论研究》2013年第7期。

给能力的150%。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亦即其最终消费所消耗掉的“地球生命承载能力”的量平均约为中等、低收入国家的2倍和4倍,其中美、英、法、日4国的“生态足迹”分别为7.19、4.71、4.91、4.17,而中国则为2.13。全球若按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人类需要4个地球来满足其每年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准此以往,到2050年,人类将需要2.9个地球<sup>①</sup>。两份研究报告虽然在具体数字上稍有不同,但哪些国家是世界“超级消费者”已十分明显。同时,这些数据也增强了我们的文明、文化自信,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因此,从环境史的视角分析海外关注和认识上的偏见,也有助于深刻理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 二、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全球话语权:必要性、可能性与路径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目标和方向<sup>②</sup>。习近平曾就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要求<sup>③</sup>。

话语体系内容广泛<sup>④</sup>,话语权乃其一。论者认为,语言是改变社会生活的武器之一,权力在话语之中得以体现和彰显<sup>⑤</sup>。话语权因而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话语权是当代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sup>⑥</sup>。历史学领域的“话语权”可分为历史话语权、史学话语权,分别涉及由谁来书写谁的历史、历史书写的能力问题。一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后者。因此,关于书写历史的形式、技艺、规范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史学话语权”的内涵<sup>⑦</sup>。但史观亦即相关研究结论和价值判断,也是历史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因为话语体系不仅是表达形式,更是思想的表达<sup>⑧</sup>。西方不少史家自认为以其“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史学所从事的中国史研究优胜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国内学界也存在“盲从”于西人研究结论或言论的现象,有学者疾呼要“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sup>⑨</sup>,史学界就如何构建史学话语权也进行了较多的研讨<sup>⑩</sup>。

关于国内中国环境史研究,学界20年前即提出了“形成有独具特色的一种专门史”的发展期待<sup>⑪</sup>;10多年前的武夷山“环境史研究高层论坛”圆桌会议上,美国学者沃斯特向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发出了“中国学界对于世界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在哪里”之问<sup>⑫</sup>。时至今日,国内环境史研究尚未自信地对“沃斯特之

① WWF. Living Planet Report 2012, pp. 6, 43, 100, 135, 140-145. [EB/OL]. [2024-11-17]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lpr\\_living\\_planet\\_report\\_2012.pdf](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lpr_living_planet_report_2012.pdf).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③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03/content\\_5354515.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01/03/content_5354515.htm).

④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⑤ [法]福柯:《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6、248页。

⑥ 张海鹏:《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16/0725/c40531-28580953.html>.

⑦ 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⑧ 王炳林:《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

⑨ 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⑩ 武向平等:《推进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价值及意义——“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学术论坛”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伊占发等:《“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史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5期。

⑪ 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⑫ 许博:《“环境史研究高层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3期。

问”做出回答,而环境史研究“独具特色”专门史的发展愿望也仍未成为现实,暴露了中国环境史研究在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2005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环境史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原宗子曾说,“环境史不仅对于既成历史学发起了挑战,还可以对当今人类的知识以及价值观体系,进行积极的改善、改良与完善”<sup>①</sup>,表明环境史研究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更是关涉知识、价值观体系及其“改善、改良与完善”。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主要基于其价值观、学术训练、自身经历与本民族经验、现实关怀等背景而展开,其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本位主义、现实政策乃至政治批评等非学术的主观意图,把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作为强化其自身价值观或某些现实主张的佐证<sup>②</sup>,具体如中国具有“破坏环境的传统”等研究结论,因此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同时,海外研究者往往喜好如中国技术与环境相互“锁定”等理论或模式的建构,作为学术研究探索,未尝不可,但与我国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实情是否相符,值得深入探讨。对于其中的一些错误或不当之处,海外学者业已进行了讨论,但国内学者对此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积极的回应。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全球学术话语权,既是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举措,更是迎接挑战,对海外研究错误结论乃至西方本位主义错误认知进行有效回应和深刻批判的需要,是学术内在理路发展和外在驱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有学者因此曾发出了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话语权的呼声<sup>③</sup>。

宏观而言,中国环境史研究已具备构建全球话语权的可能性。其一是文献条件。中国拥有以“究天人之际”为归旨的悠久治史传统,记载中华文明进程的文献形态多样,数量庞大,撇开考古发现不论,仅古籍书目著录即达20万种之多,其中见收于《中国古籍总目》者就有17.7万余种<sup>④</sup>。总体看来,传世文献关于历史的记载具有突出的连贯性特征;同时,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这些门类众多的文献如正史《汉书·地理志》、地方志书《灾异志》等不少篇目,以及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各类档案、契约、文书和护林碑刻等<sup>⑤</sup>,以直接或间接等不一的方式,记录了先人与自然交往中的相互影响、适应、制约和作用的互动关系,为我们今天“人与自然”视角下的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全球绝无仅有的文献支撑。其二是前期成果基础。中国历史研究具有突出的本土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如历史人类学等各种边缘史学、历史学与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以及如历史文献的量化处理等研究手段的采用,大大地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空间,丰富了中国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中国史研究体系也日臻完善,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环境史的实证研究方面,我国有关历史环境变迁、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的学术研究已有百年之久,积累丰厚,研究队伍规模较大,成果繁多<sup>⑥</sup>。而且近些年来在借鉴海外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学界在环境史学概念和中国环境史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学理性方面也进行了较多的探

① [日]原宗子:《中国环境史在建立新世界历史中的任务》,夏炎译,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1页。

② 刘晓玉:《环境史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初探》,《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2期。

③ 蓝勇:《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

④ 中国古籍总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012年。

⑤ 相关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颇多。如护林碑刻整理成果主要有:张浩良《绿色史料札记——巴山林木碑碣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李荣高等《云南林业文化碑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倪根金《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存》(上、下)(凤凰出版社,2018年)等。相关研究有如周飞《清代云南禁伐碑刻与环境史研究》(《中国农史》2015年第3期)等。

⑥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相关论文有所梳理。参见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钞晓鸿等《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氏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夏明方《导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新史学》第6卷,中华书局,2012年)、邢哲《近十年(2004—2013年)区域环境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等。

讨<sup>①</sup>,具备了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全球话语权的前期学术基础。其三是中国环境、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性、典型性,生长于斯的国内学者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上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因此,建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球话语权,具有源自本土的内生动力。其四是环境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对象和内容十分具体,讨论的问题较为集中,研究目标也相对清晰,学界通过攻坚合作,一定时间内可在建构全球中国环境史研究学术话语权方面取得预期成效。其五是新时代背景下新技术、新手段提供的便利。中国传世文献丰富,史学研究既往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文献查阅颇费时日 and 精力。在当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大量古籍被电子信息化,为环境史研究的文献搜求、整理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随着诸如GIS、量化史学数据库等信息手段或方法的使用和推广,建构中国环境史研究话语权也具备了现代技术或工具的支持条件。譬如,通过文字记载量化处理的办法,对明清黄河决溢史料进行等级划分,建立明清黄河决溢等级分布序列,并利用GIS的方法,确定历次不同等级决溢的空间分布,然后将决溢事件与其间流域人口数量、土地利用方式及其规模等时空分布和变动,以及气候干湿变化、黄河治理与区域社会变迁等相联系,对明清黄河决溢的环境背景、人为作用、社会后果等进行综合探究,相关研究结论不仅更加清晰、直观,而且对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大有裨益。

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话语权。愚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审慎对待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和结论。由于研究目的、视角与偏见,以及文献解读、对华夏文明与中华文化理解存在障碍等主客观因素,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历史环境的判断和认识不够全面、准确甚至错误,复以其研究存在论证粗疏等不足<sup>②</sup>,相关成果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或结论偏差甚至错误。国内学界应审慎对待其研究成果和结论,更不可盲目信从甚至简单照搬、套用其某些论断,而是在认真辨析的前提下,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对海外学界有关结论或认知作出积极回应,纠正其不当或错误的认识。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吸收、借鉴海外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强化国内环境史研究,把中国环境史研究话语权牢牢地掌控在中国学者手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学术研究高度综合性、国际化的今天,作为新兴的环境史研究,在积极借鉴如环境学、地理学、农学、气象学等不同学科,以及历史学如制度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农业史等不同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在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吸纳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著述,加强和深化国内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探讨,以及以中国环境变迁史、环境思想史和环境保护史为主要内容的实证性研究,实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认识、模式的本土化创新,进而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球话语权,并将环境史研究与中华文明史研究相融合,用中国的话语体系解读我们的文明与文化。三是走出去,用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术成果和认识影响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从而主导全球中国环境史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话语权。走出去的途径有多种,主要有在海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自2009年至今,世界环境史大会共举行了3次,历届都有

① 相关成果有如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以及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起点、进路和旨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等。

② 如易明的研究注意到媒体报道的1990年代初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汉代《四时月令五十条》,认为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繁荣对环境退化所造成的影响”(易明:《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第35页)。同样的文献,其认知视角、判断异于国内学界。佩兹考察了明清时期(1500—1911)的“环境崩溃”问题,但一则以“周期性”洪涝、饥馑和干旱作为“环境崩溃”的“标志”,其环境要素选取不当,将复杂的环境问题简单化;二则研究粗疏,具体论证主要依据二手研究成果,且研究篇幅与数百年环境变迁的繁杂内容极不相称([美]戴维·艾伦·佩兹:《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姜智芹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61页)。

国内学者出席,发出了环境史研究“中国的声音”,但与会者仍限于少数学者<sup>①</sup>;海外论文发表则更是寥寥,今后可参照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形式,创办专门的外文期刊,将国内优秀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推送到海外,助力中国环境史研究本土话语权的构建及其海外影响力的扩大。四是以话语权为基础,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并对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其中涉及“沃斯特之问”。对于沃氏之问,10余年前的与会学者就从中国环境史史料优势与多学科积淀等方面进行了回应,强调在当时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应立足于实证研究,进而在理论、方法上取得突破。然而,沃氏却从中国环境史的独特性视角回应了与会者的“回应”。他认为,相较而言,中国环境史理论、方法和论题的选择上共性大于分歧,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优势则在于其以丰富种族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与自然复杂的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多年后的2020年,沃斯特接受上海澎湃新闻的访谈,当被问及“能否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些建议”时,他进一步称“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可比性、跨国性、全球性”,并“敦促”中国学者“关注海洋,进而可能去寻找一个新的故事来讲述”<sup>②</sup>。

从沃氏的解答来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独特性。鲁迅早就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地处东亚,历史悠久,传世文献丰富,文明与文化绵延不断,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性。加强中国环境史研究和构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三大体系”,不仅对揭示人类历史环境的变迁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而且可丰富全球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其学术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中国学界对世界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其二,辩证地看待沃氏所谓中国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和论题选择的共性特征,以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缺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种族丰富和复杂的生态网络、文化网络问题。前者涉及学术技术路径,客观地说,迄今的国内环境史研究确实存在选题相近、研究方法普遍简单、结论大同小异等亟待克服之弊,全面深耕并创新中国环境史研究尚需学界倍加努力;后者则涉及价值认知和事实判断。一方面,近现代美国为移民社会,这是其丰富种族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文明国度,衡量传统中国的主体多元性,不能按照美国所谓的多种族,而应是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另一方面,沃氏强调美国具有复杂的生态、文化网络,但他对中国生态、文化网络的复杂性事实缺乏认知。中国国土广袤,自然环境多样,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多元,具有突出的复杂性,这些都是中国环境史研究无法回避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环境史研究因而具有海外学者难以彻知的复杂性。其三,国内环境史研究应有全球化的视野。沃氏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应有可比、跨国、全球性和中国学者需关注海洋史的建议颇具启发意义:学界一则要将中国环境史研究置于广阔的世界史体系框架中,探究中国环境变迁与全球其他区域环境变化的异同、互动及其社会影响;二则要善于把握全球环境史研究趋势,力求做到“同频共振”,开展学术对话,进而立足学术前沿,掌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话语权;三则要练好中国环境史实证研究内功,真切揭示中国历史环境的情状,准确把握中国环境变迁的模式,并及时总结、归纳中国环境史研究经验,进而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建构上有所作为,使中国环境史研究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从而促进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王利华:《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陈林博等:《大加速时代下环境史研究新动向——第三次世界环境史大会述评》,《鄱阳湖学刊》2019年第4期;吴羚靖等:《与环境史有约:我的历史研习之旅——梅雪芹教授访谈录(上)》,《历史教学》2020年第4期。

② 申志锋:《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史学不应边缘化非人类世界》[EB/OL]. [2020-03-3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2728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27281).